

CCTV

一起走过10年

2007 香江

领袖人物访谈录

刘文 主编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D676.58/11

2008

CCTV

一起走过10年

2007香江

领袖人物访谈录

刘文 主编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CCTV一起走过10年: 2007香江领袖人物访谈录/刘文主编.
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08. 2
ISBN 978-7-5439-3465-8

I. C… II. 刘… III. ①香港-概况 ②一国两制-成就-
中国 IV. D676. 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09066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

封面设计: 周 奔 董茜桦

CCTV一起走过10年

2007香江领袖人物访谈录

刘 文 主 编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200031)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660X990 1/16 印张15.75 字数249 000

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4 000

ISBN 978-7-5439-3465-8

定价: 28.00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编委会

主 编	刘 文					
访 问 人	刘 文	黄 卫	董 鑫	田 源		
	王 影	李 侠	孙智勇			
责任主编	李 苒					
编辑统筹	徐玉刚	徐笑梅	赵 肿			
编辑助理	武 丙	王 颖	李 昆			

目录

目 录

- 1 曾荫权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)
- 12 陈冯富珍
..... (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)
- 26 曾宪梓
..... (全国人大常委、金利来集团主席)
- 33 李东海
..... (全国政协常委、东华三院名誉主席)
- 38 何鸿燊
..... (全国政协常委、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主席)
- 40 范徐丽泰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)
- 51 唐英年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, 时任财政司司长)
- 58 黄仁龙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)
- 62 梁振英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)
- 68 俞宗怡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)

- 70 林瑞麟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局长)
- 73 邓竟成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处长)
- 77 汤显明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廉政专员,时任香港海关关长)
- 82 罗范椒芬
..... (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廉政专员)
- 86 刘兆佳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)
- 94 郭国全
..... (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经济顾问)
- 102 何志平
..... (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)
- 106 吴光正
..... (全国政协常委、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)
- 111 冯国经
..... (香港机场管理局局长)
- 116 任志刚
..... (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)
- 125 夏佳理
..... (香港交易所主席)
- 128 邝广杰
..... (香港基督教协会主教)
- 132 曾钰成
..... (香港立法会议员)
- 134 谭耀宗
..... (香港立法会议员)

- 137 黄宜弘
..... (香港立法会议员)
- 139 霍震霆
..... (香港立法会议员、香港奥委会主席)
- 143 陈祖泽
..... (香港赛马协会主席)
- 145 盛智文
..... (香港海洋公园主席、兰桂坊创始人)
- 151 徐立之
..... (香港大学校长)
- 156 朱经武
..... (香港科技大学校长)
- 162 潘宗光
..... (香港理工大学校长)
- 168 胡鸿烈
..... (香港树仁大学校监)
- 174 刘遵义
..... (香港中文大学校长)
- 180 张信刚
..... (时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)
- 185 吴清辉
..... (香港浸会大学校长)
- 188 郑海泉
..... (香港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局主席)
- 195 李兆基
..... (香港恒基兆业地产集团主席)
- 196 郭氏三兄弟
..... (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)

■ 199 郑裕彤

..... (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)

■ 201 丁新豹

..... (时任香港历史博物馆馆长)

■ 205 杨汝万

..... (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)

■ 208 王家英

..... (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)

■ 212 吕如意

..... (香港国民教育中心总监)

■ 214 金庸

..... (香港作家)

■ 219 梁凤仪

..... (香港作家)

■ 223 吴思远

..... (香港导演人协会会长)

■ 226 曾志伟

..... (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)

■ 230 艾尔敦

..... (香港总商会主席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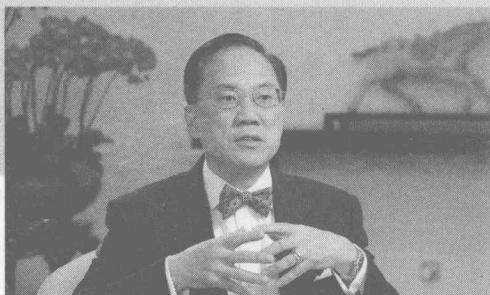
■ 234 苏利民

..... (香港英国总商会主席)

■ 237 祈裕庭

..... (香港美国总商会主席)

■ 240 一次触动心灵的旅程(后记)



曾荫权

(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)

曾荫权

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

记者：“港人治港”、“一国两制”是香港 10 年来最大的变化，而“港人治港”保证的是“一国两制”下最大的不变，在政府方面，从执行政府变为决策政府，而您作为一位香港人，从一个公务员成为香港特区的最高长官，依旧为香港市民服务，在就任行政长官前后，您感受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您个人的发生变化又是怎样的？

曾荫权：最近 50 年，我从小孩子成长到现在，真的感觉经过了很巨大的变化。不单是经济上的变化，社会上的变化，政治上的变化——10 年前发生的，我们香港的回归。我有幸看到香港由一个小小的工业地区变成国际化的大城市，由一个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变成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，港人治港，这整个过程的变化是惊天动地的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的终身的事业是公务员工作。我是 1967 年开始做政府的工作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40 年，到过不少的部门，做过不少的岗位，但是我现在回想以前的工作状态，没经过多少起伏，没有什么大的改变，一开始我对自己要求就是任何的岗位、任何的工作都尽量做到最好，全力以赴。得到最好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用香港人讲的是“做好这份工”的态度，全力以赴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更是一样，但是岗位不同了，两年前，我开始做特首的工作，工作的经验和要求给我带来了新的挑战。

以前我做公务员工作，对事情都是集中在数字事实，客观的观点，尽量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放在事业里面，我希望有清醒的头脑，分析清楚，用客观的态度，量化每一个事情的困难度，作出最好的决定、建议。但是发觉做特

首以后,这个要求有一点不同了,我需要的是、要研究的是,决定政策背后的人情,老百姓的心理,对他们的影响,不但是对社会整体的影响,还要考量对个人家庭的影响是怎么样的,这就比较困难,比较复杂了。特别需要多一点聆听,多一点研究,很多的时候,要研究清楚,走下去,走到每一个家庭里面,最后我决定用一个以人为本的方法来处理事情。

这个过程变化对我自己来讲,工作态度变化不小,但是我感觉是好的,结果也是不错的,这个不单是我个人,我们是一个统一观念的领导班子,我鼓励他们采取统一的方法,从公务员的研究,从政绩方面、人情方面结合起来,所以我们就觉得,最后提出的政策更巩固,更有效,更近民情,更紧贴着民意。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意义是十分巨大的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我来自基层,跟香港的市民一起经历了无数的起伏。在香港,60 年代我们有一个大的经济危机,90 年代有一个更大的金融危机,有 SARS 的考验,但是香港本身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——我们香港有一个特性,我们拥有奋发向上的精神,自强不息,什么时候都要做到最好,凭着每个人的努力,迸发出一个很大的集体力量,这个精神帮助我们克服了以前不少的困难,不断地进步,不断地发展。

1997 年以后认为,我们港人治港,香港是我们的家,老家,这个感情更深,更强,更重要。所以有的事情,我看来是没有变,但是有的事情在变,对个人、对社会的影响整体来讲是很好的,很好的经验,很好的变化。

记者:您曾经多次代表香港出访很多国家,在出访的过程中,为香港做了大量的推介工作,其中的原因是什么?在您出访的过程,您如何感受和评价国家和香港在国际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?

曾荫权:我们香港是一个商贸城市,是一个开放的城市,我们的生存,我们的发展依靠的是商贸,外贸利润是我们本地生产总值的几倍,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系,比很多其他城市更开放。所以我要维持不断的与外间的联系。

在特区政府中,不单是特首,我们所有的主要官员,还有我们的秘书长也经常出外,出外的目的是什么呢?我们要清楚世界最近的发展怎么样,要把握外面的情况,更重要的是向世界介绍香港最近发展的情况,特别是 1997 年以后我们的发展。

对外国人来讲,很多人对 1997 年的转变抱着一个悲观的态度,我们要消除他们的误解,这个误解可能是我们文化的差距,可能是我们地域方面的差距产生的,所以我们要面对面,这样可以谈比较敏感的问题,解释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,要消除误解。这样,对提升他们对香港将来发展的信心很重要。在投资发展方面,通过香港辐射他们的商业活动,对内地也很重要,所以我认为我出外公干是职责所在。

这几年改革开放以来,内地经济发展也很快,这是一个全世界瞩目的、巨大的经济体系。这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事实。

跟我们改革开放开始时的情况相比,这个变化是很惊人的,我去内地,现在是经常去,每两个月跑一次,每一次我都很感动,经济发展的快速,我以前在香港见过,我们 60 年代、70 年代发展速度十分快,但是跟今天内地的情况相比,也是令我很佩服的。不单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这样的大城市,小城市也是一样。

我跑了湖南、广西,每一个地方我看到的发展速度都是很惊人的。这个发展不但是经济的,其他方面也是一样。比方说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,比方说我们成功地申办奥运会,每一件事都表现出我们国家整体的综合实力增强了。

还有,国家的发展和香港的发展,在香港回归以后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协同效益。我们经过了一个香港经济困难的时期,遇到金融风暴、SARS 的情况,但是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,我们都知道香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依靠——国家,国家以无私的态度对香港,不但给我们香港带来一个很快复原的机会,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反思,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了,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? 所以,每一次有困难的事情发生以后,我们克服和复原速度始终是快的。

我看了一下,在金融风暴以后,国家有特别的政策,有 CEPA,有个人游的方案,这就能产生双赢的局面,对我们讲这个是最好的政策了。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机会研究香港将来的路线、发展的方向。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特点,我们的强项。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里也能看清楚,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、航运中心、贸易中心,反映出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特别关注,这是我们发展的重点。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,让内地企业可以利用这个很理想的平台走出去,另外是外国公司利用香港这个平台,加

强他们走进内地的投资,也是香港作了一个有效的贡献。

作为香港来说,有一件我们一定要提的事情就是国家申办奥运,我们香港也有一个项目,赛马在香港举行,比较其他内地城市可能是我们香港的长项。

还有一件事,就是我们香港的陈冯富珍女士成为世卫的总干事,这是华人第一次当上联合国组织的一把手,香港当时感到很骄傲。这是得益于国家的支持,1997 年以后香港人看得很清楚了,香港发展,在经济,特别是政治方面,得到国家的支持,现在香港已经是发展得很不错了,我对将来是很有信心的。

记者:回归 10 年以来,您无论做什么职务,一直到作为最高长官,都为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,很多的重要事情都跟您有直接关系,应该说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,从您的角度来看,您对香港 10 年来实行“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”怎么评价?

曾荫权:最重要的是,邓小平先生讲的这个“一国两制”制度,是一个全新的概念,全世界从来没有的,我们有两种制度、两种生活方式、两种货币、两套法律,还是两套价值观,所以是开始的时候,80 年代、90 年代对这个构思是半信半疑的态度,但是到今天,我们可以问这样几个问题,第一就是这 10 年香港同内地的交往是否越来越紧密了?第二是香港对国家及中央的认同是否确实越来越高了?第三就是香港是否还保持它独特的制度,没有改变,香港有没有它的独特的制度、生活方式?价值观有没有改变呢?如果是您问这些问题,我相信答案全部是肯定的。

第一,我们香港同内地的交往,每一年增加的速度很快,甚至每一天差不多有 40 万人,从香港往内地跑,50 万、60 万,甚至 70 万,交往是很密切的。关于香港对国家的认同,我们香港不停地有调查,有普查,是在不停地增加,不停地提高,这个是事实,香港知道国家对香港的重要性。另外,还要看看我们的价值观,我们的生活制度,完全没有改变,一样的自由,一样的开放,法律制度都没有改,港币还是流通的货币,我们香港公务员制度也没有改变,生活方式没有改变。从这几个方面看,实际上更加强,更巩固,还有两地的经济交流经过一个很大的考验,亚洲金融风暴的考验,我们经历了这个考验脱颖而出,我们看到了是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全面成功。

记者：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您当时在一线，在前线指挥作战，表现出永不服输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，这种精神对于香港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很重要的，当时您在那样的位置上，那样的压力之下，您的心态是怎样的？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？

曾荫权：金融危机，是我在工作经历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，之前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冲击，包括第二次大战。这个事情是回归后一天后发生，如果是这个事处理不好，不但对经济有影响，对整个“一国两制”的落实，也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当时的压力都很大。

但是我经验的是，我的感觉这 10 年，最大的冲击不是金融风暴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印象最深的是 SARS 的经历。它所带来的不单是很大的压力、心理的不安，它也让我们吸取了经验教训，最重要的影响，是对香港老百姓，对每个阶层都有大的影响。当时有医生、护士牺牲，老百姓也有因病去世的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这是我人生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但通过这个事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在 SARS 期间，香港出现了很多真正的英雄，以前我们香港很少讲英雄感，同外国很不同的，没有人渴望做英雄，对英雄歌功颂德的心情在香港很少的，但是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付出了全部，付出了一切，发生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。我最不能忘记的是，我们有一位年轻的谢婉文医生，她是自愿到 SARS 的病房工作的，是 24 小时的工作，为病人治病，最后，很不幸，她感染了 SARS，牺牲了。

我的感觉，他们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的英雄。香港的这个经历，真是激发出我们香港人真的精神，所以我很希望的是我们这一个 10 年，大大小小的起伏，有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考验，也有不少的成功，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些经历，特别不要忘记我们那些牺牲了的英雄，他们展示的是我们香港人性光辉的一面，我们一定有责任要继续下去，作为一个特区的特首，我也有这份责任，对这个事情，我是感觉很骄傲的。

记者：您作为特首，提出了“强政利治，福为民开”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，您提出这些主张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？最近几年实施的效果如何？

曾荫权：我们看 2004 年、2005 年香港的情况。金融风暴之后，又经历了 SARS，香港失业率很高，已达到 8% 以上，我们的 GDP 也下降，不上而下，这是我们很多年没有发生的事情。香港人已经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对香港没有

信心,对前途也失去信心,针对这个局面,当时我补选特首的时候就提出了“强政利治,福为民开”的口号。

我深信,这是可以回应当时情况的需求的。做事果断,回应要快,深入了解老百姓的情况。最重要的是回应的速度,决策要准确、推行正确的决策要有力度,结果就会不错。当然,当时经济方面也有改善,经济好了,消费也好了,旅游方面又恢复了,贸易也做得好了,金融市场也蓬勃起来了,整个局面就会让“强政利治,福为民开”做得更好。“强政利治,福为民开”本身就是以民为本,是建立一个有效执行管治的文化。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果断,有效地回应市民的需求。如果没有了以民为本,也就不能强政,这背后的意思一定是以民为本——这不但是当时适用,将来也适用,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策略都要做得准,要快,还要讲得清楚,透明度要高,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民众的利益。

记者:其实包括您就职以后,政改方案的提出,也是政府回应和满足民意的诉求,也是作为政府“强政利治”的表现,而且对香港的民主进程有很强的推动。当时媒体说,政改失败的时候您很伤心但是没有流泪,时至今日,您对此已经表现得很平和,觉得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惋惜。对于政改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?为什么说香港的民主进程是要循序渐进地推进?

曾荫权:任何的政治改革,有影响的事情很多,这可能不单是一个政府内部的改革方面的效应,最重要的是对经济、对社会,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,如果是做得不好,不但是对民生有影响,长远地讲,对经济也是有影响的。还需要很负责地提到的问题,我们不是从头开始,本身已经承受了以前殖民地的政治结构,那么我们要变动,一定要小心研究这个变动,会对香港各方面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,所以循序渐进的这个政策一定是需要的。这不仅是香港,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国家,都是经历了很长远的时间,他们民主的发展不是几年的事情,是几百年的事情。

1997 年以前,殖民统治时期,我们没有一个民主的基础,但是民主发展是很重要的,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要做得更好。从香港的长远需要来看,民主应该是重要的,我们的《基本法》也定下了这个目标,所以我们国家认同这个目标,香港人认同这个目标。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,我们要讲方法,讲方式,做得好了就是整个过程和谐地进行,产生了和谐的社会。我们要小

心地做,所以2005年我提出了我们改变我们的制度,这是迈向普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。

当时香港的市民都支持我,大约60%都支持我,还有大部分的立法会议员都支持我,而且我也有信心,中央政府应该会支持我的。但是最后我没得到2/3立法会议员的票,差几票,最后就是不通过。

当然我是觉得失望,但是我都没有放弃,我们立即成立一个政策发展委员会,重新研究这个问题。还有是在这次参选的时候,我答应香港人,在任期内,我要彻底解决这个补选的问题,我准备在今年的下半年,年中以后,就发表政治发展的绿皮书,提出我们争取普选的这个方案、做法,作为给公众提供的咨询,咨询以后,我希望可以做到一个主流的意见,主流的方案,给中央考虑,尽量争取在我的任期内,可以达到一个目标,就是解决这个问题,我不希望这个问题在我任期完结的时候,也就是2012年,还没有做好,又交给下一任特首,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
记者:确实是这样,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,香港目前的民主状况确实不是一个理想式的口号,它应该需要协调很多复杂的因素,在稳中求进,所以我想,您应该会能满足全体香港市民对您的期待。另外我注意到,您在很多大型的国际会议、大型的活动,中,都不忘推介香港,您说香港是一个最好的城市,最独特的城市,足以和纽约、伦敦媲美,您觉得在“一国两制”下,香港独特的优势和卖点在哪里?

曾荫权:香港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,它不但是我们中国的特别的城市,也是整个亚洲一个特别的城市,您看亚洲地区,我相信找不出香港这样的情况。主要有几点,第一就是我们一个很国际的价值观,很特别的。我们是开放的城市,我们有国际的网络,我们欢迎每个国家的人在香港做生意,不单是做生意,还有在香港居住,建立他们的家庭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,就是我们有国际化、公平、自由的平台,尊重每个人的权利,有包容的态度。

最重要的是,我们是一个中国的城市,这是很特别的东西。另外,我们香港的经济的市场,诚信度是很高的,不单是我们消费的市场、旅游的市场,我讲的是金融市场,是保险市场,还有法律服务、专业服务,香港做得已经有国际地位,很诚信。

整体地讲,香港与全世界相比较,欧洲的伦敦,美洲的纽约,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。所以,我们有本身的基础,还有我是充分地保障了知识产权,品牌在香港可以做开发,鼓励文化的创业,这个是香港有诚信的基础。

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本身的价值观,我们有比较健全的法制制度,还有就是公平的商业原则、流通的货币、高效率连接的公务员体制、个人自由、企业自由的态度,这个对跨国公司,外国人在香港投资做办事处是特别有吸引力的。再加上 CEPA 的拉动,来香港做生意、建立亚洲的办事处的跨国公司,比任何其他城市都多。最重要的是我有内地的关系,有 CEPA 的关系,有国家的支持,这是个很大的市场、很大的福地。任何其他城市,无论是韩国的首尔,还是马来西亚的槟城,每一个城市都没有具备我们刚才讲的各项因素,所以我对香港是很自豪的,但是不自满,每一点我都清楚。香港的特点是我们的长项,同内地的发展是有很大的配合,但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独特的地方,做得更好,比以前做得更加好,我相信这是香港成功的道路。

记者:确实,从您担任特首至今,我们可以感受到您对加强内地与香港的交流是非常重视的。您也曾经在一个讲话里面谈到,国家和香港都是属于我们大家的,爱国、爱党是每一个人的本分,这可以看出您作为一个爱国、爱党的身体力行者内心情感的流露,那么我们想问一个问题,在回归之前,很多政府的公务员有一些忧虑,就是回归以后会不会有这样、那样的变化,但是经过 10 年,大家对“一国两制”政策和祖国都有了新的了解,您怎样看这 10 年中香港政府公务员及港人在国家历史、民族认同和国家大政方针认识上的变化?

曾荫权:应该说,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。这 10 年我们在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。不但是公务员方面、教育方面,小学、中学的课程也已经纳入国情教育。大学当然有他们特别的课程。在公务员方面,有关《基本法》、国家的情况所有的公务员一定要通过必需的训练单元。

除了我们主动做这些工作以外,更重要的是,看公务员的回应是什么样的。最近我读过一篇对一个海关人员总会主席的访问,他说,公务员除了工作、全力以赴完成特区政府的任务以外,应该建构国家的观念,多做表达爱国的行为,所以除了做分内该做的工作之外,他还积极地策划他们海关人员访问内地做交流,希望强化香港海关人员同内地海关人员充分的、多方面的

交流,包括文化的交流、友谊的交流等。他希望可以加强员工对国家的归属感。不单是海关,警队也是一样,很多的部门,都是一样,所以两地的交流人员每一年增的速度很快,我相信这个是自发的。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担心,香港爱国的情操应该是会很快被培养出来。我要关注的不光是我们公务员一代,还有下一代,怎么处理,我刚才讲了,就是教育的投资,教育的改革,刚过去的10年是个开始,下面10年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。

记者:对,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,比如说国民教育中心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,比如说很多学校的升旗仪式,包括维多利亚幼儿园三四岁小朋友升国旗唱国歌、朗诵诗歌,还有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香港公务员,可以看到港人对国家的了解和认同程度正在提升。我们在一些材料上也看到,香港要更好地发展,就要善用它背靠祖国的优势,我们注意到,最近几年,在两地交流方面有很多进展,您是如何看待内地和香港日益发展的、密不可分的关系?

曾荫权:我这几年做的工作,不但是工作上的需要,也是我自己真的希望多了解一些内地的情况。而我们的公务员,还有处在领导地位的人,希望他们对这个事情有同样的关注。我们开始是在珠三角跑,后来是大珠三角,就是现在的泛珠三角九省,每一次都交到不少朋友。我们的目的很多,有政治方面社会方面,让两地人员沟通多一点。

我们到的每一处,每次去的地方,香港媒体都跟着我去,报道当地的情况,让香港人看到内地不同地方的发展,这是十分重要的。实现“一国两制”的推进,对国家的认识是重要的,另外有经济方面的作用。

根据市场的需要,我们香港的融资能力很强,投资能力很强,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外来投资者,差不多每个省最大的外来投资者都是香港,但是大部分是我们大的企业在做,而香港最重要的不是大型企业,而是中小企业,他们需要政府方面给他们做拉动的工作、做我们所说的开门人的工作,所以每一次我去内地,我希望带动香港的中小企业去,特别是把专业团体、律专家,会计公司,工程公司,带到内地。还有就是我要介绍香港可以为内地服务的东西,希望内地有规模的企业利用香港的平台走出去。

所以每一次在内地跑,有很多作用,有政治方面、社会方面的需要,当然